

## 焦點評析

# 是春還是冬：

# 回顧十年後的阿拉伯之春

---

## Spring or winter: a look back on the Arab Spring 10 years later

張景安 *Ching-An Chang*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系助理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壹、前言

猶記十年前突尼西亞街頭起義時，不同評論家對該事件之發展與後續影響抱持不同論述。部分學者認為街頭自焚僅為單一獨立事件，又有他者認為該事件乃中東區域情勢的一大轉捩點，更有學者將阿拉伯之春視為是人類歷史上第四波的民主化。然而可知的是，沒有哪位學者在起義爆發前能準確預測該事件的起始與後續發展，及其於區域他國所引發之骨牌效應。在突尼西亞的事件後，區域國家相繼淪陷，埃及總統下臺，葉門總統逃亡，利比亞陷入東西對戰，敘利亞從人民的起義落入長達十年多的內戰。即便經濟情況相對優渥的海灣國家，亦面臨了不同程度的社會挑戰；然有幸於該些國家富足的能源及國際上以西方為首國家的強烈支持，還不至於陷於他國所面臨之泥淖。有人說這不是「阿拉伯之春」，因為數以萬計人民失去生命，區域國家陷

入動盪，原本看似平靜的生活變成了人間煉獄般的戰場。筆者認為，該事件無疑是當代中東區域最重要且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而衝突所致之斷壁殘垣及百姓傷亡是不爭且殘酷的事實，但長遠來看，這是一場通向在全球化下所需面臨的「難以避免的惡」。更重要的是，此事件於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後的發展，更是值得我們所關注。

## 貳、為何會有阿拉伯之春？

不同學者就阿拉伯之春之起因進行分析，大致可歸類為政治、經濟、宗教及氣候等四種論述來闡述。以政治方面解釋阿拉伯之春起因的說法，乃歸咎於這些國家普遍缺乏民主，老百姓在威權體制政權下受長期統治。在此情勢下，人民無法表達其不同於執政者之意見，而多是受到被動的壓迫；加上腐敗政府的治理，百姓對政府政治表現上的不滿因而爆發了衝突。從經濟角度切入，則會以該區域國家在經濟上的表現來做推論，舉凡高失業率、低經濟成長率等，而越貧窮的國家似乎更能合理化該類經濟發展不良所致的人民街頭起義活動。再加上財富、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更激起長期被剝削人民的不滿。而宗教引發阿拉伯之春的觀點則認為，乃是因為該區域的遜尼、什葉兩宗教派系間的競爭及不和因素，人民對其所屬宗教的忠誠致使對他者的敵意，而引發國家內部不同宗教派系的動盪。最後，則是以氣候變遷的角度來探討阿拉伯之春的起因。該類文獻則是以氣候變遷所導致的雨量、溫度等變化，進而影響中東區域的農作收成為造成區域動亂的原因。在此情況下，老百姓在糧食上的減產，直接牽動到了民生物資的供給，這也使得老百姓因為氣候因素而無法有足夠的收成量或因此在飲食上的不足，直接轉變為一場針對當局者的糧食革命。

上述四種論述似乎或多或少都可以解釋阿拉伯之春的爆發。然而，若進一步去探討這四種論述，我們似乎會發現所有的論述皆存在有一定的不足性。從政治角度來說，阿拉伯國家哪一個不是長期威權體制、老百姓言論自由受限，又全世界哪一個國家沒有政治腐敗的問題？若真乃政治因素所致革

命，又為何非所有阿拉伯國家皆面臨同樣的挑戰？又為何有些國家即便面臨挑戰但可以盡速的平定（特別是海灣國家）？又或為何是遲滯 2010 年才爆發？而經濟因素的論點，若真的是越貧窮的國家就越有可能爆發阿拉伯之春，就中東各國於阿拉伯之春前的國內生產毛額進一部進行比較，舉凡阿爾及利亞、約旦、摩洛哥及茅利塔尼亞四國皆較利比亞的表現來的差，且摩洛哥和茅利塔尼亞更低於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甚鉅的埃及，然該四國並未爆發出利比亞或埃及程度的大規模起義或政權更替。宗教派系為當代中東衝突討論中時常被視為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之一。然綜觀整個中東區域，不同宗教派系的存在由來已久，更可追溯至千年之前。若伊斯蘭內的不同派系關係可解釋為阿拉伯之春起義的原因之一，又為何這類所謂的宗教派系衝突未曾於當代中東國家內部爆發類似的政權危機？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之春起使時，鮮有所謂以宗教派系之名所進行的起義活動，以敘利亞的起義而言，當地百姓一開始的抗爭訴求僅為「改革」，而是到了一年多後的 2012 年中，方於敘利亞國內街頭可見政府所懸掛的「不要教派衝突，只要敘利亞」的口號。而氣候變遷的論述，似乎應該是一個全人類皆會面臨到的問題，若該論述合理，我們應該會看到世界各地類似出於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糧食問題衝突。然而，這似乎是我們所未見到的。即便阿拉伯之春已歷經了十年之久，然學界仍對起義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論述。

### 參、政權的更替與不更替：換湯不換藥？

在此波起義的浪潮下，最顯而易見的便是部分在位多年的國家領導人改弦易轍，諸如突尼西亞班阿里 (Zine El Abidine Ben Ali)、埃及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葉門薩立赫 (Ali Abdullah Saleh)、利比亞格達費 (Muammar Gaddafi) 等四人。這幾位分別於其國家內擔任元首介於 22 到 42 年，元首的下臺對當地的百姓能以自身的行動來達到政權的轉換而言，不外乎是一劑強心針。然而，上述四國的後續情況是，埃及短暫的經歷了民選出來的穆希

(Mohammed Morsi) 總統，而於一年後遭軍政變推翻，由軍方的西西 (Abdel Fattah El-Sisi) 成為總統；葉門成為了沙烏地和伊朗兩大代理人戰爭的衝突區；利比亞則是畫分為東西邊政府的對抗。唯一較被視為成功的例子僅有突尼西亞，但是學者對其日後轉型的看法亦多有分歧。

阿拉伯之春下的政權更迭在其他國家似乎不是那麼的順遂，像是敘利亞或巴林的情況皆是。鑒於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薩德 (Bashar al-Assad) 的背景，一方面年輕，另一方面又是留學西方背景，原本被看好並不會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然而，敘利亞亦未能免於此次的區域政治波動，當南方 Darra 省官員發現當地學童於牆壁上的反政府塗鴉出現時，以暴力方式制止，又於之後不滿政府暴行的百姓上街向政府爭取公道時以武力逕行鎮壓，敘利亞人民積怨已久的心情才爆發了出來。即便敘利亞反抗軍曾一度於 2012 年中有機會將阿薩德家族四十年的執政更換，但因為西方援助的退縮及反抗軍本身的不合，加上俄羅斯及伊朗的強勢介入，使得敘利亞無法完成政權更替。而巴林的例子，則是當地皇室在面臨了老百姓的抗議時，立即連繫其鄰國沙烏地以尋求援助。而沙烏地這個做為巴林長久以來的誠摯盟友，便理所當然地派軍進入巴林，以協助該國穩定反對勢力。而其他海灣五國，則能夠以較為富足的油元所得分配予百姓，進而不淪於其他阿拉伯國家政權威脅的情勢。

從上述兩個反例觀之，即便少數國家的元首因此有所更換，更一度出現了民選的領導人，但最終國家的制度仍是恢復到阿拉伯之春前的領導體制。對當地國家的人民來說，國家政治制度上似乎未有任何明顯的改善，反倒是這十年來面臨的更多的動盪，生活中增加了更多的不安。然而，在此看似未有改變的局勢下，上百個公民團體於此時期產生，原本對政治多抱持冷漠的百姓部分開始覺醒，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不僅侷限於受阿拉伯之春所影響的單一國家內。

## 肆、未來的展望

在此起彼落的浪潮下，面臨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內部人民在政治上可大致分

為三類，親政府、中立以及反政府。可想而知的是，所謂的親政府人士並不會離開原本所屬國家，而反政府及部分中立人民可能在衝突之下，轉而奔走他國以尋求安穩的生活或其理想中的抱負。於直接的短兵相見的衝突外，就屬這波移轉至他國開闢新生活的龐大移民（或更精確地說，難民）至關重要。於當代不同國家建國的歷史可發現，海外的人民對於其母國內的建國事務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些離散（*diaspora*）的人群，因為長久居於他國，能夠獲得更多不同的資源，舉凡教育、人脈、技能、財富等，故當母國陷入危機或是有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他們便能隔海參與其中，扮演一定的影響力，舉凡現今的以色列和中華民國的建國初期，便可看到這類離散人群於政治中所做出的貢獻。是故，即便阿拉伯之春歷經了十年，我們也較難看到一些立竿見影的成效，數萬人民死傷於此波起義浪潮，但改變的心已深植於當地人民的心中。加上數以百萬計的離散人口於當地區域內轉居或甚至流至於西方土地，即便他們的旅程是在一個被迫的情況下發生，但在十年或二十年後，相信整個中東區域會有一群新血回歸，並能試圖改變當前我們所認為的局勢。

責任編輯：白如君

